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 主编)



Researching on British Eco-Marxism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倪瑞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 主编)

Researching on British Eco-Marxism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倪瑞华 著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倪瑞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王雨辰 主编)
ISBN 978-7-01-009622-3

I. ①英… II. ①倪… III. ①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英国
IV. ①Q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8328 号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YINGGUO SHENCTAIXUE MAKESI ZHUYI YANJIU

倪瑞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622-3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总序)

王雨辰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如果从徐崇温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算起,至今也不过25年时间。然而,这25年时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认识不断走向深入的时期。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理论视阈的不断拓展,使得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其一是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使得他们对于如何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分歧乃至激烈的争论。其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间出现了双向互动的格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更加深刻地研究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群体不断扩大,研究范围逐渐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回顾和分析上述三个特点形成的过程和所包含的信息,对于我们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我国学术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上述三个特点,实际上也标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按照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徐崇温先生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是出于理论自觉,而“从一开始就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

来的: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领受任务时说,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①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关键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存在着双重的错位。从社会历史背景看,虽然经过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但总的说来我国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起步阶段,加上“左”的教条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性的批判等话语系统一时还很难为我国学术界所理解;从理论背景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正统,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反对这种解读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看做是打了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即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引进和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性著作和代表性观点,为日后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一些准备性工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1986年以后,客观上要求正确认识和评价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哲学理念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批判地反思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的理论得失,体现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更深入的探索和理解。理论视角的变化,使人们对于如何理解、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争论热潮,争论的目的就是要摆脱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建构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图景。这场争论不仅使学术界熟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深化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且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影响,我国著名学者张一兵先生曾经指出:“最初接触这一新的理论领域,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时是在徐崇温先生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

^① 徐崇温:《徐崇温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中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思想流派的。在当时的直觉中,有一种深深的震惊:研究马克思哲学还能这样出彩。”^①而为了获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权,迫使他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即“回到马克思”^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主体性问题”、“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人学”以及“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③无论是否存在这种解读模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具体体现在:一是研究主题进一步扩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生态批判等,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共鸣,使得学术界从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一步扩展到研究其社会批判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二是研究方式从过去的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研究和追踪研究,学术界不仅出版多部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同时也出版了多部研究专题性问题、研究代表人物的著作。在追踪研究方面,分析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阈中,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开始关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等,并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统称这些在后现代思潮中理解、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从而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

回顾我国学术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①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页。

② 张一兵:《深度解读: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

③ 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

历程,给我们比较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是:应当立足于怎样的哲学方法论来认识和评价不同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模式,以此为裁判权,那么就势必不可能客观地看待和认识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是否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回答和解决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这事实上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会在实践过程中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流派发展是其必然结局。而这一切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本性使然。跳出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深入了解西方社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

但是,也需要指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也暗含问题。其一是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并由此引发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它到底是否反对列宁主义。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的确和恩格斯、列宁是有差别的,但是“有差别”是否就是反对“列宁主义”,这是一个需要细致研究的问题。部分学者为了避免研究之前预先设定主观框架,于是用一个比较中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地域性概念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有特殊内涵的,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产生,以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目的的一股思潮。只是后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教条主义的压制之下,才不得不在西方共产党外发展。不论其理论是否正确,但是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是对国外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形成各种理论思潮的总称。这其中既有同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流派,也有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还存在着仅仅只是借鉴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与马克思保持名义联系的后现代思想家。显然,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思潮在价值和意义上根本无法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其二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是并不能说已经很深刻。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性问题

研究、人物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事实上,学术界关注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群体在不断缩小,更多的是引进和评介 20 世纪后期出现的各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冷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是令人担心的,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是笔者所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的重要研究方向。自 1981 年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点以来,就一直开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和研究方向。2006 年我们又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研究方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近年来我们先后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引进学术带头人和年轻博士,形成了学术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团队,并把研究领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为主体,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学科点,被纳入学校“211 工程”建设项目。这套丛书就是我校“211 工程”建设项目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中的著作或者是我们学术团队部分教师的各级各类研究课题,或者他们的博士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持续不断的出版和若干年的努力,不仅进一步搞好我们的学科建设,形成我们的学科特色,而且为推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目 录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代总序)王雨辰 /1

引 言 /1

第一章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述 /10

第一节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 /10

一、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野 /11

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22

三、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23

第二节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流及其特点 /26

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26

二、两个阵营的对垒 /30

三、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 /38

第二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相关性 /42

第一节 本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重建 /42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43

二、“生产主义的”、“普罗米修斯的”历史观 /48

三、走向绿色的历史唯物主义 /51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立场 /56

一、佩珀: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生态学价值 /57

二、格伦德曼: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分析生态问题 /62

三、休斯:人依赖于自然的生态原则 /65

第三节 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辩护 /69

- 一、格伦德曼:重返人类中心主义 /69
- 二、佩珀:马克思主义的“弱”人类中心主义 /75
- 三、休斯:马克思主义的扩展的人类中心主义 /81

第三章 “支配自然”与“适应自然” /87

第一节 本顿以“适应自然”取代“支配自然” /87

- 一、批判“支配自然”的观念 /88
- 二、本顿“适应自然”的立场 /90
- 三、技术革新的生态意蕴 /96

第二节 格伦德曼对“支配自然”的积极解读 /98

- 一、追溯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思想的渊源 /98
- 二、重审马克思的自然观 /102
- 三、赋予“支配自然”积极意义 /108

第三节 格伦德曼与本顿之争的评论 /112

- 一、关于本顿的“适应自然”的评论 /112
- 二、关于格伦德曼“支配自然”观念解读的评论 /115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承认自然极限 /119

第一节 环境主义与新马尔萨斯主义 /119

-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与自然极限 /119
- 二、环境主义者对指数增长的恐惧 /12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马尔萨斯主义的冲突 /128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 /128
- 二、马克思的解放战略与自然极限的冲突 /134
- 三、追问超越自然极限的解放 /136

第三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极限的多维考量 /139

- 一、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意识形态批判 /140
- 二、马克思关于自然极限的多维考量 /143

三、马克思的解放战略未超越自然极限	/149
第五章 未来绿色社会的政治模式	/155
第一节 现有社会制度的双重幻灭	/155
一、生态危机成因的诊断	/156
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	/159
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生态反思	/163
第二节 建构未来绿色社会的两种范式	/167
一、未来绿色社会建构的两种范式	/168
二、本顿思想发展的逻辑: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综合	/173
三、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	/176
第三节 走向绿色社会的两条路径	/182
一、思维方式决定路径走向	/183
二、生态自治主义:温和的形象预示法	/184
三、生态社会主义:激进的变革	/187
结 语	/190
 附录一 国内关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综述	/194
附录二 国内外关于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研究的综述	/210
参考文献	/226
后 记	/236

引言

20 世纪前半期人类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危机,而后半期的最突出问题则是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高温、干旱、洪水、地震、泥石流等极端的自然现象频发,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生态的、核的、化学的和基因的风险以及职业事故和疾病的风险,这表明现代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风险社会。风险意味着启蒙运动以来所开始的现代化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人的理性力量及主体地位、科学的权威、解放与进步的观念等都遭到质疑、解构和颠覆,社会制度体系的维护与权威不断在削弱。为了规避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灾难普天而降,人们开始反思和批判现代性,促进风险社会向生态社会、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阿伦·盖尔所说:“应对这次的生态危机需要作出的变化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把所需要的变化称之为创造一种新文明也不算太夸张。……我们需要创造一种‘生态文明’。”^①可见,生态危机为人类设计新的前进路线提供了机会。生态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创建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和资金问题,而是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因为,每种社会类型和文明形态都有相应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人类迄今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种文明形态。在狩猎文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人与自然混沌统一的世界观,原始人在自然母亲之手的牵引下,双脚轻柔地踩在大地上,除了自己的脚印之外,他们没有给大地留下多少痕迹。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是有生命的、

^① [澳]阿伦·盖尔:《走向生态文明:生态形成的科学、伦理和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 年第 1 期。

生长着的和渗透着神性的。“自然”(nature)一词源于希腊文词根 gene,表示“使生长”或“生长于”,具有生命的含义。古希腊人有一种可贵的直觉,感知到自然界是一个有着自身生命的、渗透着神性的、处在不断的生长过程之中的有机体,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是从这个有机体中生长出来的。最原始的“自然”概念,指的就是这种生长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自然”的原始含义的主要意思是“自然而然”,没有什么比生命的诞生、成长更自然的了,它不需要理由和原因,正如植物的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一样。原始人对于这个有生命的自然、神性的自然充满敬畏之感和崇拜之情,在朦胧混沌中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开始开垦和浇灌土地,铁犁深深地耕入其中,在不经意之间触痛了自然母亲的躯体,造成道道伤痕。这就是说,在农业文明时代,从总体上来说,人类采取的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态度,但在局部地区造成生态破坏,更有甚者因生态破坏而导致文明的崩溃,如两河文明、玛雅文明等。恩格斯对此有着具体的描述,他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①从恩格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农业文明的发展轨迹是统治阶级强化对农民的剥削,并通过农民强化对土地和森林的剥削,破坏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系统,最终导致文明的崩溃和人口的崩溃而进入一个黑暗时代。随后,历史的车轮驶进了近代社会,在炼金术、占星术中诞生了化学和天文学,并以此为基础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揭开了自然的神秘面纱,一种有生命的、神性的自然死去了,而变成了一部可拆解和组合的机器;自然作为养育者母亲的形象退去了,而代之以狂野的、混乱的、需要加以统治和控制的自然形象;养育者地球的思想被统治地球的思想所取代。“随着‘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学革命’的推进和自然观的机械化与理性化,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的隐喻逐渐消失,而自然作为无序的这第二个形象唤起了一个重要的现代观念,即驾驭自然的观念。两种新的观念,即机械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成了现代世界的核心观念。”^①现代世界是一个工业文明的世界,把整个自然贬低为服务于人的工具,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纯粹的主—奴关系。这种机械的世界观对于自然来说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而商业的自由贸易突破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建立起世界市场,又将生态的破坏和毁灭推向了全球。工业文明的特征是通过大量使用化石原料、帝国主义和大规模的战争,高度强化了对自然的剥削,它也走上了同农业文明一样的轨迹,只不过是,它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和文明危机是在全球规模上的,这同时也造就了现代文明生态转向的紧迫性。

生态文明是一种在工业文明统一起来的世界秩序中产生,将超越并彻底改变工业文明,是一种全球性的文明。生态文明的主旨在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生的关系,它既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又致力于利用生态系统生产的循环过程,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断地完善这种和谐机制;既强调人类活动的工具性和技术性,又强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生态关怀。生态文明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之上,生态世界观强调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相互依赖和统一的特性,其价值就存在于这个完整的体系中。“盖娅假说”、深层生态学是这种生态世界观的典型倡导者,在生态世界观的视域中,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有机体”被理解为高度整合的生态系统,而“生命”同样被理解为生态系统,是一种存在共生关系的动力过程的共同体,其各个组件之间相互约束、彼此协调,以促进共同利益,再生产和发展各自繁荣所需的环境条件,并因此维持它们在生命共同体中的存在。这种生态世界观要求人们选择一种存在的生存方式,弗洛姆指出人的生存方式有两种,即占有(having)的生存方式和存在(being)的生存方式。在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占有和所有的关系,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包括

^①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他自己在内都是他的财产,在这里没有生命关系,只有物的关系,因为主体并不是人自身而是人所拥有的东西;在存在的生存方式中,人与世界保持一种确定的联系,它揭示一个人或一个事物的真实本质和真正的实在性,这是一种主动的存在,人具有独立、自由和批判的理性,也是每个人自己所体验到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它激发人们的给予、分享和勇于牺牲的愿望。工业文明时代,占有的生存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它不仅扭曲了人的本性,导致人的异化,而且扭曲了自然的本性,导致自然的异化。创建生态文明首先要摒弃占有的生存方式,而主动地选择存在的生存方式,建立起人与世界的有机的生命联系,使真实的人性和真实的自然性统一起来。

生态文明创建就是要化环境破坏型的风险社会为生态可持续型的生态社会,它不仅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还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价值观。欧洲绿党和美国绿党构筑了“十大关键价值观”,即生态智慧、尊重多样性、权力下放、社群为本的经济、社会正义、基层民主、非暴力、女性主义、个人与全球责任、注重未来(或称可持续性)。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A. 科尔曼指出,这十大价值观看似互不相干,实则是紧密一体的世界观的不同方面,它们以一种非常根本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共同传达着生态社会的价值诉求。^①

与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转型的同时,在实践上社会运动也发生了转型,即由传统的工人运动转向了以妇女运动、环境运动为主体的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主要成分是一些非正式的、松散的政治组织或民间团体,如环境保护局、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环境联盟等,它们成为政府政治决策的压力团体,要求把可持续发展、环境关心纳入政治决策领域。它们的社会目标不再是为特定的社会群体争取直接利益,而更多地表达像环境保护、和平、公共健康等那样的社会普遍关注,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新社会运动的出现是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生活世界不断殖民化”和工业增长导致的文明危机的结果,因而,新社会运动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如生态运动攻击现代化的生态破坏结果,反对

^① 参见[美]丹尼尔·A. 科尔曼:《生态社会的价值观》,载杨通进主编:《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页。

启蒙以来西方中心论的理性权力暴政,主张以差异性、分散性对抗一元论和中心性等,这也折射出了新社会运动的两个突出特征,即一是告别工人阶级政治,二是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但是,应注意的是,新社会运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和“1968年革命”、70年代大规模的生态运动和90年代的反全球化运动这样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尽管其间掺杂了多种政治思想因素,但它始终未脱离新马克思主义的主控和渗透。

以上所分析的风险社会向生态社会、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和新社会运动,这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人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这一自19世纪诞生以来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追问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是否具有相关性,马克思主义是否能为当代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以及生态文明的创建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社会主义运动是否能与生态运动相融合。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们与日俱增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学派。他们不仅将现代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而且向纵深发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进行生态学的解读,挖掘其中所包含的深邃而丰富的生态学思想,构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和辩证方法论的理论指导。可见,马克思的思想幽灵始终游荡在世界的上空,它始终“在场”,从未“退场”,时刻关注着人类面临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困境,并为其提供阐释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指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生态学等理论形态的产生,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是否具有生态学思想的争论,都表明时代在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态和环境问题也是马克思的问题域,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分析和解决现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哲学基础。

在21世纪这个生态学的世纪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创新性的突出反映,有力地驳斥了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生态盲区或理论空场以及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论调。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上说是为人

类面临的现实的生态问题提供一种解释和解决方法的新视角。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在他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词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约翰·福斯特等,我国学者也开展了对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翻译出版了他们的著作,并对他们的思想进行相应的研究。然而,我国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北美地区学者身上,而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多。其实,欧洲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尤其是英国的一批学者如戴维·佩珀、瑞尼·格伦德曼、泰德·本顿、乔纳森·休斯等也是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支生力军,不应缺失对他们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本书力图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性研究。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立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与现代的生态学相结合,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进一步展开了如何理解支配自然、自然的极限、资本主义矛盾等问题的辩论,在此基础上构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况和发展动态,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新的素材,扩宽研究视野、加深研究层次和夯实研究基础。同时,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理论问题对于我国创造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生态文明”概念最早是在 1984 年由苏联学者提出,1987 年中国学者叶谦吉引入到国内,2007 年 10 月写进了中共十七大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在生态理论研究和现实的生态实践中,对人类中心主义、支配自然、自然极限等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困惑而陷入实践的困境,往往易于把它们与生态问题等同起来,而又不可能为了生态的利益放弃这些观念和人类的利益。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展开的激烈争锋,有利于澄清这方面的认识和帮助人们走出实践困境提供了一些参考,并对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生态考量和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兴起和发展肇始于泰德·本顿在 1989 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然极限:一种生态批判与重建》一文,他提